

书院,是古代培养人才的“摇篮”。据史料记载,抚州书院文脉由唐至清,延续千年之久,其中两宋时期尤为兴盛。抚州古代书院数量在江西省乃至全国均位居前列,对各地书院的兴起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具有江西特色和抚州辨识度的地域文化标识。

当代书院活化的抚州实践

——以青田书院与仰山书院为例

陈永刚

书院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独特地位。它不仅是古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术思想的策源地和地域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江西素称“江右书院甲天下”,历史上曾涌现书院近两千所,抚州更是书院林立。据悉,仅金溪一县,有确切记载并保存较好的古代书院,学塾便为众多多。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复兴浪潮的推进,多地书院相继重启或转型。位于抚州市金溪县的青田书院与仰山书院,一个在乡村、一个在城区,路径不同却各具代表性,共同构成了当代书院活化实践的“抚州样本”。当作为古代教育机构的功能已不复存在,书院如何在当代找到新的生存方式?本文涉及的两座书院,用实践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虽然方式不同,但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回到人群中去。

两座书院的历史底色与基本概况

青田书院位于金溪县陆坊乡乡湾村,始建于元代,至今已有700余年历史。这座乡村书院几经兴废,至21世纪初已建筑破败,长期闲置。2021年,返乡青年、金溪雕版印刷非遗传承人洪志文主持修缮书院,将空置的祖屋加以修缮,以较小投入让书院重开门扉,将周边的竹林、稻田、菜地转化为书院的天然耕读资源,使乡湾村逐渐形成一个融合古建、文脉、农耕、研学等多重元素的乡土文化空间。

仰山书院位于金溪县秀谷镇王家巷,前身为陆九渊与朱熹讲学的南宋崇正书院,清乾隆二年(1737)在崇正书院遗址上建仰山书院,其名寓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金溪乡贤为纪念陆九渊而建。光绪二十八年(1902),仰山书院改为金溪县官立学堂,民国初期又改为金溪县高等小学。新中国成立后,金溪县政府对仰山书院进行多次修缮,妥善保护,现占地面积1000余平方米,保存了清代建筑格局,2000年被公布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两座书院,一座为民间重建运营,一座是城区文保单位,定位不同,面临的处境却相似,建筑本体虽存但原有的教育功能已消失,亟须在当代找到新的存在方式。

两种路径:书院活化的抚州实践

青田书院:民间力量驱动的活化探索。青田书院的活化,核心依托于“人”的回归。洪志文作为返乡非

官学化与民间性；

抚州书院千年来的张力与平衡

黎茜茜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既承载着教化功能,又维系着民间学术传统。据统计,抚州历代先后创建书院157所,是江西省创建书院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抚州素有“才子之乡”之称,宋元明清四朝共出进士2400余人,其人才产出之丰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书院。然而,抚州书院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在于其人才产出的丰硕,更在于它在千年发展中所呈现的独特张力——官学化与民间性的持续博弈。

抚州书院的民间底色

名儒乡贤办学是主要形态。抚州拥有深厚的民间办学传统。北宋时,许多乡贤、名儒自发投入书院建设,江西古代书院中影响最大、生徒最多的书院之一南城盱江书院,便是由著名理学家李觏于庆历三年(1043)创建。元朝立国后,许多不愿入朝为官的南宋遗民在抚州自行创立书院讲学。如大儒刘君举,自筹资金创建管陶书院,在此教书育人。明代时,吴与弼于家乡小波村创办小波书院,开创了“崇仁之学”,培养出胡居仁、陈献章等一批批学术大家。清代理学家李绂,于乾隆四年(1739)倡议在香楠峰原址上重建兴鲁书院,并与临川知县李廷友共同完成修建工程。同年李绂又捐银助倡,于城南青云峰临川县学故地修建了青云书院。正是在这些名儒乡贤的努力之下,抚州书院在朝代更迭的动荡中得以延续。

教育对象的开放性。抚州古代的民办书院秉承“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招生没有地域、身份、年龄、地位的限制。李觏创办的盱江书院,史载其“门徒千人”,该书院创办后“乡曲俊异从而师之,东南闻风至者常数千人”,这正说明盱江书院的教育对象跨越了地域限制,与官学按籍贯定额招生的封闭性形成鲜明对比。明代罗汝芳在南城从姑山创办从姑山房,接待前来研习学问的人,上至朝廷高官,下至乡野农夫、制陶工匠、胥吏小民,只要有求学的愿望,皆可成为他的学生,这种开放性,正是抚州书院“民间性”最生动的体现。

抚州书院的官学化进程

南宋——制度开端。南宋时,朝廷向书院赐额、赐田、任命山长已成为惯例。淳祐十年(1250),县令王中立重修槐堂书院,知州叶梦得在记文中记载:“今复析荷源寺废田以补之,月拨县解,郡用钱楮以助之,月用钱楮……以提督之权归之于令,凡有更创易置之事,则必次第而闻于郡,庶几上下相维,可持于久,修规立程,著为定制。”人事上的“提督之权

遗传传承人,既是书院运营的主理人,也是金溪雕版印刷手工技艺的县级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书院活化的基本路径:以非遗为内容、以书院为载体、以社区及周边群体为对象。

书院推出一项“非遗唤醒计划”,邀请非遗传承人担任讲师,并利用书院空间打造“青田书院版本馆”和“非遗体验工坊”,开设雕版印刷、手作豆腐、宋代点茶等非遗技艺宣讲、体验课程,让书院空间服务于文化传承,让参与者不再只是隔着展柜观看,而是通过亲身体验,感受到中国传统技艺中蕴含的无穷智慧。

同时,青田书院并未止步于成为一处非遗展示空间,而是有意识地向周边社区和学校敞开。书院利用每月固定安排的知识讲座、政策宣讲、家风主题活动,让周边村民逐渐养成进书院的习惯,通过在各个节日开展写春联、慰问留守老人、组织观影等活动,营造和谐乡村生活。与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江西水利电力大学、抚州医药学院、东华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合作,搭建实践平台,开展普法宣传、普通话推广、耕读体验、探访红色历史等活动。此外,书院设立的“心学讲堂”以情景剧的方式呈现“鹅湖之会”的故事,将“象山心学”用通俗易懂的方式阐释并传播出去。2026年,金溪青田书院成功入选江西省书院研学旅游精品线路,其以非遗体验为核心内容的研学模式,已被验证为书院活化的可行路径——它不是停留在“参观老房子”的层面,而是让参与者通过操作真正进入文化现场。

仰山书院:城区文保单位的公共化转型。仰山书院的活化思路与青田书院截然不同。它的优势在于地处城区,又是文物保护单位,天然便于接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尤其是与地方教育资源深度整合。

仰山书院现已与周边学校合作,成为学生的校外教育基地。2024年秋季开学时,金溪县仰山学校把入学首课搬进了书院,学生们在仰山书院内齐声诵读陆九渊的著名诗句“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带队教师表示,书院将开学第一课放在此处,正是希望学生们在此了解陆九渊的治学之道,以先贤的智慧启迪他们更好地成才。

书院的日常运营则靠另一条脉络支撑。书院的藏书阁里藏有千余册图书,其中与陆九渊相关的学术著作多达百余种,公众可在此免费借阅,附近村庄的留守儿童及周边学校的学生是这里的常客。书院还不定期推出“读书会”,形式涵盖名家讲座、读书分

享、古典诗文诵读等,广受欢迎。逢年过节,还会安排留守儿童聚在书院写春联,提供公益放映等暖心服务。

从空间布局来看,仰山书院并非孤立存在,它所在的王家巷一带,已被纳入金溪县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盘活方案当中。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改造后,巷道里相继引入非遗展陈、地方陶瓷研究等业态。2025年“五一”期间,这条街区涌入超八万人次,书院作为其中一处节点,也随之热闹起来。

经验与启示

两座书院的实践,也为散布于城乡的大批古书院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了一些可以参照的思路。

一是从单纯的授业传道之所转变为复合型公共空间。传统古代书院的根本职能在于培养科举人才,这一功能现已不复存在。金溪两座书院用它们的经验表明,活化的关键不在于模仿古代形态,而在于重新定义“有用”。无论是青田书院将雕版印刷从文献记载转化为可亲身经历的日常体验,还是仰山书院将“心学”精神与资源转化为中小學生可接受的校外教育内容,形式虽有变换,但文化传递功能仍在以新的方式延续。

二是要回归日常,才能让建筑重新被使用。青田书院和仰山书院在实践效果上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重新成为“有人去的地方”。青田书院的非遗体验和仰山书院的免费图书借阅,都在做同一件事:让这些老建筑重新纳入人们的日常活动范围。对于最大面广的基层文物保护单位来说,“被使用”,而不仅仅“被修缮”,才更能延缓衰败的进程。

三是要尊重地方性,明确活化的内容必须从本土资源中生长。雕版印刷之于青田、心学之于仰山,都不是外来植入的概念,而是基于金溪本地历史积淀的再提取。

当代书院的活化,并非简单恢复旧观,亦非另起炉灶。青田与仰山两个书院案例的共同启示在于:历史建筑要在当代存活,需要在传统内涵与现代生活之间找到有实质内容的接合处——非遗技艺、经典教育、社区服务、文旅融合等皆可成为选项。金溪的经验表明,对于遍布各地的古书院遗存而言,最有韧性的保护方式,就是让它重新成为人们愿意走进去、愿意待下来、愿意再返回的地方。

结语：书院的当代价值与未来展望

结语：书院的当代价值与未来展望

创办的书院以外,明清以后,由官员倡办的书院增多,但其经济命脉仍高度依赖民间捐赠。明万历年间,侍御周孔教与知县吴用先捐资倡办崇儒书院,但真正推动书院落成的则是“暨绅诸生戚乐从事”。东乡知县吴名凤,于道光三年(1823)向士绅、乡贤发起倡议,号召捐建汝东书院,但其于道光四年(1824)已调任德化县知县,在其调任之后,汝东书院仍在众乡绅的合力下成功建成。清代时,有临川生员桂殿芳一人捐银一万四千六百两创建浚阳书院,置田七百余亩;乐安何文芳一人捐岁入租谷两千八百石田产,营建安浦书院;金溪仰山书院嘉庆二十一年(1861)大修,获民众捐资六千两。可见,尽管经费逐步由官府控制,民间捐资始终是抚州书院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

学术传承始终由民间维系。槐堂书院在南宋步入官学化后,其经济与行政归官府管理,但主教傅子云仍是陆学门人,书院教学仍以讲论陆学为中心,在官府控制的制度外壳下,学术内核仍在民间传承。明代吴与弼在其创办的小波书院讲学,开创了“崇仁之学”,崇仁学派是在官方体制之外的民间土壤中成长而成,为明代心学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思想先导。清顺治九年(1652),朝廷严禁“别创书院”,而谢文潄以“学舍”为名,在南丰创建程山学舍,与宁都魏儒、星子宋之盛等人,大举讲会,广论程朱学脉,堪比“鹅湖之会”。以“学舍”代“书院”,既是对禁令的规避,也是民间学术在制度夹缝中求生存的智慧。

形成官倡民助的办学模式。经济上的支持与学术上的传承,使民间力量始终在场。同时,朝廷需要书院承担人才培养的职能,书院也需要朝廷的认可以获取发展的空间。正是在这种官学化与民间性的相互交织、不断调适中,逐步生成了官倡民助的办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地方官员负责发起倡议并提供部分启动资金,而建书院所需的大部分资金、田产和人力,则依赖地方士绅、商贾和民众的捐助。如本文提及的崇儒书院、汝东书院便是官倡民助创办书院的典型,此外还有仰山书院,乾隆二年(1737)由知县阎廷信发起倡捐,民众集资完成建设;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由知县万国荣发起倡议拆旧更新,官民鼎力相助完成,皆是官民合力创办书院的模式。

综上所述,抚州书院的生命力正是来自名儒的学术感召力、乡绅的持续捐输与“有教无类”的开放传统。官学化为书院带来了制度保障,也导致了书院自主性与讲学精神的流失,然而其始终未能切断书院与民间的血脉联系。这一历史经验也给当代书院的复兴和发展带来启示:不应只依赖政府投入,更需要激活民间的热情与学术的纯粹性,唯有如此,书院才能真正“活”在当下。



流坑文馆内部

文馆,位于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牛田镇流坑村北陌兰洲,又称江都书院,始建于明代,是流坑村历史最悠久且保存最完整的书院遗存。建筑坐北朝南,面向全村,东北部有乌江环绕,东部有山峦,西部有龙湖。文馆曾名为“文馆祠”,是一所集祭祀与教学为一体的学馆,原与大宗祠、桂林祠共同构成一个三祠并列的建筑群,现大宗祠与桂林祠已毁,仅保留书院建筑。书院主体为三进式砖木结构,平面呈纵向长方形,西侧有花园及藏书楼,兼具读书、讲学、祭祖、敬贤、藏书功能。本文从庭院布局、空间序列、装饰艺术、符号象征四个维度对文馆的美学特征展开分析与考察,以呈现文馆作为一座明代遗存的空间美学价值。

庭院与对称——秩序中的仪式美学

文馆的大门为双开门,门额题“儒林发藻”四字,穿过门额,便进入文馆的前庭,院内地面铺花岗岩石条,东西两侧分列对称的长方形泮池,池中间有一单拱纵向石构步桥,过桥后,登上三级台阶即至主体建筑的门廊。这一庭院布局,通过空间的三重过渡,将进入者从外部世界的日常状态中逐步抽离,带入一种有序、庄重的心理状态。

东西泮池对称布置,在视觉上构建出平衡与稳定的基底。但这组对称并非仅为审美偏好,实质上是传统“礼”与“序”的空间转译。当学子步入庭院,迎面而来的均衡格局,已将感知从外部杂芜中剥离,交付给一个由秩序主导的空间。

对称的双池之间,一座单拱步桥纵向跨越而过,既框定了视线走向,也将身体的运动引向前方。建筑学研究表明,轴线“本质上是线性状态,因此它具有长度和方向性,并沿着它的道路,引导运动、展示景观”。跨过泮池的过程,使“进入书院”这一行为从单纯的平面位移,转化为一次有意识的空间穿越。

跨过步桥后,三级台阶将地面抬高,门廊随之显现。台阶的抬升在物质层面上标志着一个明确的空间转换节点,如果说庭院承担的是一种“过渡”功能,那么登阶而上即为到达,登阶时身体的上升动作进一步强化了心理上的“进入感”,完成了从“门外之人”到“门内之士”的身份转换。

对称的布置、纵向的跨越、上升的仪式转换——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多重过渡序列。进入者在此完成的,不仅是物质空间上从庭院到主体建筑的过渡,更是从日常松散向士人庄重心理状态的切换。这正是文馆前庭空间布局的核心机制——通过空间的铺排与过渡,完成身体与心灵的双重转换。

空间序列——“逐级登高”的叙事美学

经前庭步入文馆的主体建筑空间。文馆主体建筑分三进,首进由下堂和前天井两部分组成。下堂两侧各有一间房,供老师及学生休息;前天井以条石砌筑成“回”字形,两侧有三间耳室,是学子们的书房。二进包括中堂和后天井,中堂为讲堂,先生在此传道授业解惑,后天井西侧辟有一门通向藏书楼。三进为上堂,即整个书院面积最大的享堂,用于供奉祭祀西汉大儒董仲舒等名臣、先贤,神圣庄严。自下堂至上堂,地面逐级升高,这种平面设置,一是在于启示学子们追求学业要循序渐进,逐级攀登,二是也随着下、中、上堂空间的功能从“读书、休息”变为“讲学”再到“祭祀”,从“日常教学”向“精神崇拜”过渡,凸显出各部分建筑地位的差别,强化了祭祀空间的神圣感。

这并不是简单的建筑构造,而是一种典型的空间叙事手法。进入者无需通过文字或图像说明,仅凭身体的物理经验便能感受到“进学如登高”的隐喻和肃穆感的逐渐递进,使身体的“向上”与心理的“向敬”同步发生,从而对知识、对先贤产生逐步叠加的敬畏情感。正如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指出:“身体的空间性不像外部客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是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其中“身体的空间性”指的是通过身体在世存在而被体验和构成的空间,这意味着空间并非一个客观容器,而是通过身体体验“产生”的。文馆“逐级登高”的设计,正是将“处境的空间性”转化为可感知的建筑体验,并不“讲述”事理,而是为进入者的身体创造一种“感受”事理的方式。这种“体验即理解”的空间设计,是中国传统书院建筑中极具智慧的美学策略。

藻井与天花——色彩与工艺的交融

进入上堂后,空间的氛围陡然肃穆。文馆的上堂是供奉先贤的“神圣之地”,也是整个书院建筑中装饰工艺最为精美繁重的部分。室内上方有一六边形天花藻井,顶部天花以冷色海藻纹为底,以红、绿彩绘花卉、八宝,并作石榴形、扇形开光,中间绘山水、花鸟及诗句。藻井周边透雕窗花图案,顶部分六区,透雕荷叶宝瓶纹,基调为暖色。据介绍,藻井多年未经打扫,但仍旧清爽无尘。

这种布置具有多重审美效果。一是冷暖色调对比的审美张力。天花采用冷色海藻纹打底,辅以暖色图案点缀,藻井则整体采用暖色基调,形成视觉上的节奏变化,进入者抬头仰望时,视觉顺序经历了“冷—暖”的色彩转换,既营造出空间向上延伸的美感,也让藻井成为整个穹顶中最为醒目的部分。二是透雕工艺形成的空间层次。一方面透雕工艺使平面的“实”与镂空的“虚”交错分布,在视觉上产生立体感与纵深感;另一方面,在不同光照下,明暗在透雕图案上交替变幻,也为藻井增添了层次感;同时,六区分割的结构赋予藻井一种稳定的几何秩序感,这与天花彩绘的灵动形成对比。虚与实之间、明与暗之间、动与静之间,共同构成了文馆藻井丰富的空间层次。三是材料与功能的统一。藻井“清爽无尘”的现象可能是材料驱虫或通风结构设计的结果,但这本身也构成了一种美学效果——洁净、明朗、不被虫鸟困扰,赋予藻井一种“超凡脱俗”的审美气质。

匾额——空间中的符号美学

整个文馆,匾额随处可见,贯穿始终。前庭门额以行书题“儒林发藻”,从后天井西侧入藏书楼,藏书楼前是一天井,前方墙壁上有两处漏窗,中间草书“瞻之在前”,藏书楼二楼为文昌阁,文昌阁悬匾“日进高明”。这些匾额题字在文馆的建筑空间中具备双重功能。一是装饰功能,书法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对象,行书的流畅、草书的灵动,赋予建筑独特的艺术趣味。二是具有空间引导功能,门额“儒林发藻”标定了书院的文人空间属性;文昌阁“日进高明”旨在勉励学子精进学业;漏窗中间的“瞻之在前”则在空间深处制造了一种“前方有可追寻之物”的期待感。

这些匾额以文字为符号“命名”空间的属性,与庭院布局、空间序列、藻井装饰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审美空间并相互呼应,整个文馆形成一个“以空间来讲述”的叙事体系。

综上,文馆的空间美学可概括为三大特征:一是叙事性——以“逐级登高”的空间序列,将“进学如登高”的理念和对知识、对先贤的敬畏精神转化为身体经验;二是秩序感——以对称的庭院布局、递进的层次结构,塑造书院特有的仪式感与庄重感;三是装饰美——以色彩对比、透雕工艺、匾额书法等表现手法,构筑兼具雅致格调与教化功能的空间氛围。作为一座保存完好的明代书院遗存,文馆的建筑空间与装饰美学的价值,不仅在于“美”本身,更在于它让进入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空间的“教化”,这是一种“润物无声”的审美体验。

(本版作者单位均为抚州市博物馆)

五至八版责编:冯朝晖 何文娟 陈颖航 版式设计:焦九菊